

第二集

史學論文
研究會論文
集

台灣史研究會論文集

第三集

台灣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三集

- ◎ 台灣史研究會主編 / 出版
- ◎ 一九九一年四月初版

通訊處：台北郵局第 13—211 號信箱
劃撥帳號：王曉波帳戶 1128598—0

每冊定價新台幣 300 元

台灣史研究會論文集第三集

王曉波

前言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八日，本會經大會通過決議於暑期組織“大陸學術訪問團”，共分社經、政治、文學、建築四組，分別由尹章義、鄭梓、林瑞明、閻亞寧四位教授負責，而於七月二十二日成行。訪問團經過廈門、上海、南京、北京，並分別和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上海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南京東南大學工學院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舉行兩岸學術交流的研討會和座談會，這個論文集便是這次訪問團在兩岸學術交流時所發展的論文，共二十七篇，也是本會的第三本論文集。

由於國際冷戰結構的解體，和兩岸互動關係的發展，“台灣研究”遂成爲一時之“顯學”，而歷史研究實爲一切研究的根本。如何讓大陸更理解台灣，和如何讓台灣更理解自己，必將是未來兩岸互動關係的一個重要的課題。基於這樣的認識，本會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底在台北舉辦“台灣史學術研討會”時，即邀請大陸學者與會而未遂，本會即於該年暑期組團赴大陸訪問，雖遭受困難而終於成行，事後本會分別出版了二集的論文集。爾後，本會又有二次古建築訪問團至大陸，不再遭受阻擾。爲了讓大陸理解台灣，只有台灣方面的大陸學術訪問是不夠的，政府必須儘速開放大陸學者來台訪問才行。因爲我們認為理解是一切良性互動的基礎，兩岸的良性互動又是未來中華民族整合的基礎。

回顧本會成立以來，台灣史研究會在促進兩岸的學術交流和理解上，應該是盡了我們應盡的“歷史”責任了。雖然，台灣地區已經解嚴了，但是一些台灣歷史的問題還

沒有能得到應有的歷史解決，例如，本會曾經從事平反的“王敏川案”，以及“二二八事件”。歷史不是“彫古董”，而是“鑑往知來”和“資治通鑑”的，除了在未來民族整合的過程中提出歷史的理解外，如何解決一些台灣歷史的問題，也當是台灣史學者和台灣史研究會未來努力的目標。

面臨著未來兩岸關係的互動和台灣逐漸民主化的形勢，我們願以這本論文集與所有的台灣史學者和台灣研究者共勉。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次

- 從少年劍士到總統
——李登輝成長的過程 尹章義 — 1
- 李登輝執政後“大陸政策”的調整 周世躍 — 13
- 戰後美國對台政策
與海峽兩岸關係之展望 王曉波 — 27
- 台灣“國會”改革運動研究 劉國深 — 51
- 日據時代櫟社成員的經濟背景分析 鍾美芳 — 67
- 台灣總督府對福建路礦權益
的滲透與擴張 陳小衝 — 83
- 賴和〈獄中日記〉及其晚年情境 林瑞明 — 97
- 從性度看海峽兩岸女性文學的差異 黃重添 — 117
- 鯽魚潭開發史之探討 陳奮雄 — 135
- 清代台灣邊疆移墾社會之特點
與媽祖信仰 李祖基 — 191

台灣移民開發史上 與客家人相關的幾個問題	尹章義 — 211
憂患意識與台灣近代化 —兼論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等人對台灣的經營	鄧孔昭 — 235
九十年代台灣政治的走向	杜繼平 — 253
台灣“政治轉型”問題之研究	李水旺 — 267
從台灣政局趨向看兩岸關係	李家泉 — 289
略談“轉型期”和 台灣民主運動的性格	周 青 — 295
從唐山、半山的聯合治台 論福佬沙文主義 ——《光復以來的省籍問題》	尹章義 — 305
蔣氏父子處理省籍矛盾政策之淺析	戴文彬 — 317 曹 慧 — 317
從立法院的轉變看 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進程	林聖芬 — 335

- 政治轉型期中的台灣“立法院” 楊立憲 — 357
- 一九四九以來
台灣試行地方自治之探源 鄭 梓 — 367
——從“偽自治”到“半自治”
- “國是會議”與台灣地方自治問題 范忠信 — 377
- “台灣意識”之我見 殷存毅 — 385
- 日據時期的
台灣獨立革命與李友邦將軍 王曉波 — 395
——兼論台灣革命青年團與台灣義勇隊
- 八十年代台灣社會激蕩及其思考 王建民 — 427
- 現代化社會中的歷史街區保存 閻亞寧 — 437
——鹿港古市街的個案研究（一九七五—一九九〇）
- 中國建築語彙在台灣的
發展過程與實例研究 吳光庭 — 457

從少年劍士到總統

——李登輝成長的過程

尹 章 義

（輔仁大學史學系教授）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蔣經國總統逝世，當時擔任副總統的李登輝先生依法繼任總統。此後兩年六個月，在李登輝主導之下，國家政策和高層的人事變動不知跌碎多少觀察家們的眼鏡。今年三月，李登輝獨排眾議，提名“多做事少說話”的李元簇為副總統；五月份又甘冒軍人干政之大不韙提名郝柏村籌組“治安內閣”，更使台灣從“貪婪之島”一變而成為“猜謎王國”。觀察家們無法解讀李登輝的“高招”、“怪招”、“險招”、“絕招”；紛紛宣稱李登輝具有學者的“知識傲慢性格”、“傳教士的狂熱”傾向，甚至宣稱登輝擁有“過人的政治智慧”，因此，“天威難測，為凡人所不及。”

李登輝果真難以理解。還是觀察家們忙於捕風捉影而疏於“理解”李登輝呢？

一九七二年六月，李登輝以農業經濟學家、大學教授的身分被蔣經國延攬入閣擔任政務委員，七八年六月轉任台北市長、八一年十二月改任台灣省主席，八四年二月就被蔣經國提名；擔任副總統候選人。何以在短短的十一年另八個月裡，李登輝以一介書生就能超越第一代的台灣政治明星謝東閔而躍升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總統呢？

當時的中國國民黨和台灣的上層政權結構體，仍然是一個講究政治倫理，同時根據歷史背景、地域、階級、效忠程度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來分配政經資源的生態系統。在這個近乎封閉的系統中，李登輝竄升之速不僅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後的。除

了天時、地利、人和（詳下）之外，李登輝亦必有其過人的精力、能力和特殊的氣質而為蔣經國所賞識。

一、斯巴達式教育下的少年劍士

早在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繼蔣經國任總統之初，許策在分析“李登輝的政治體驗與從政風格”時便已歸納出幾項要素：“農民意識”、“本土意識”、“宗教意識”、“公權力意識”及“自由思想”，雖然筆者認為李登輝沒有“農民意識”只有“為農民服務的士大夫意識”，而李登輝“對自由理念的信仰”並不明顯，但是，像許策這樣認真“理解”李登輝的觀察家也不太多。本文則試就歷史經驗論和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當前最重要的人物。

李登輝一九二三年生於台北三芝，一個依山面水的農莊。父親是小地主也是警察，隨著父親勤務的調動，李登輝的童年在三芝附近的汐止、南港、淡水等小鎮度過。出生地無法選擇，與生俱來的“本土意識”自然形成。日治時代的學童教育分為三個系統，日本人唸“小學校”、漢民族唸“公學校”，先住民唸“番學校”，各有不同的學制與教材。公學校畢業的李登輝很想進台北的師範學校，由於“種族別”的“差別待遇”連考兩次都沒能考上。事經五十多年，一九九〇年春天李登輝在接受日本“文藝春秋”記者訪問的時候，還提起這段“雖然成績不錯，卻不被錄取”的往事。考不上師範學校李登輝才從“公學校高等科”插班進入基督教系的淡水中學就讀，經過四年的努力，終於考進全台最優秀的“台北高校”。當時一班只有四、五個台灣人。在不平等的教育條件下，能超越許多日本人而考進台北高校，實在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前述坎坷的求學歷程，充分的反映出李登輝堅強的意志與毅力，只要下定決心，他一定全力以赴，不達目的絕不甘休。最近李總統逆風揚帆，力排眾議而提名李元簇為副總統、提名

郝柏村爲行政院長，並且史無前例的一一親自拜訪“投票人”拉票，也都能順利票決通過，充分顯示李登輝的個人意志與毅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三年間，是台灣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蓬勃地推展的年代。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黨、台灣民衆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甚至台共等組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而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文化啓蒙運動，學生、工、農抗爭運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一九三二年上海事變，中日兩國產生嚴重軍事衝突日本又扶植成立“滿洲國”之後，日本人對台灣的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也展開強烈的鎮壓行動，遂使台灣人的反對運動消沈下去。在大屯山西、東、南麓各小鎮和農村中輾轉遷徙而度過幼年時期的李登輝，在當時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不過從李登輝近年對付台灣反對陣營和海外異議人士所持的態度看來，前述的台灣歷史經驗，對於李登輝應當是不無影響。

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中、日全面戰爭展開，八月十五日台灣軍司令宣布全台進入戰時體制。原本就崇尚“斯巴達精神”的日式教育，此後更厲行“軍國民教育”；斯巴達精神和軍國民教育，對於那個時代成長的青少年都產生深遠的影響，一九三七年進淡水中學、一九四一年進台北高校的李登輝也不例外。他們對於“紀律”和“效率”的要求相當嚴格，與同時期中國大陸的缺乏紀律和效率相比，二者自然產生格格不入的感覺。光復以後的二二八事件以及多年來的反對運動，和這種感覺有密切的關係。李登輝每次演說、記者會甚至接見民意代表、教授學生時一臉嚴肅的表情以及右手握拳作槌擊狀的肢體語言，充分顯示青少年時期受的教育，對他產生深刻的影響。他任命郝柏村組織“治安內閣”，除卻現實政治的考慮之外，“紀律”和“效率”應當是他的基本的要求。

李登輝青少年時代的照片，現今流傳最廣的是穿著軍訓服

裝和淡水中學李姓同學一起合影的照片以及一張身著“擊劍裝”的個人照。

高中一年級的班際對抗賽中“我一人便擊倒了對抗班的全體選手而獲勝”，更是李登輝津津樂道的少年故事。每當他講這個故事時一臉飛揚的神采，彷彿又回到神采飛揚的“少年劍士李登輝”的時代。擊劍時的全神灌注以及靜如處子動如脫兔的移位以及電光石火剎那之間決勝負的精神，我們在李登輝處理台灣動盪不安的政局的手法上，也可以很清晰的分辨出來。不少精於中國傳統太極劍法的劍士在詫哦之間便已經敗在李登輝的劍下。

對李登輝影響最大的，可能是台北高校時代教“東洋史”（中國史）的鹽見老師。李登輝從異族的鹽見老師那裡首次了解到中國所受到的苦難，五十年後他還說：“那真是一種強烈的體驗”，他也受鹽見老師的影響放棄研讀西洋史的想法而研究中國問題，更從鹽見老師那裡受到啓示：“解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而選擇到京都大學攻讀農業經濟。由此觀之，李登輝為農民服務，出於自身是農民的“農民意識”者少；而出於“愛國意識”或出於經過有意識的反省的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者為多。研讀農業經濟是李登輝一生最佳的選擇。

二、狂飆時代的青年紳士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展開，次年四月，日本在台灣以志願兵為名，徵召台灣青年入伍，十月開始徵召學生。李登輝的兄長李登欽便在這種情況下，被徵召到菲律賓充當軍伕，從此下落不明。由於戰爭的關係，各級學校都縮短修業年限，把青年們提早趕赴戰場。一九四三年秋天，李登輝提早一年從台北高校畢業，隨即進入京都大學讀農業經濟。由於京都一帶並未遭受盟軍飛機的轟炸，李登輝除了目睹民間缺糧之苦，而體驗出“農業太重要”的真諦，

從此更堅定他從事農經事業的意志之外，他仍然維持青年紳士閒適悠雅的生活方式，讀讀哲學，逛逛京都的名勝古蹟或到禪寺禮佛坐禪，直到一九四六年大局抵定；之後才回到台灣來。李登輝在京三年，正是台灣遭受軍事統治最酷，遭遇戰爭災禍最烈的時候。近二三十年來，台灣民間極力推動的“對日索賠運動”，諸如台灣人前日本兵的賠償撫卹、欠餉、軍郵儲金、軍票、保險等償付問題，都未獲得合理的解決，一方面是由於國民政府不願索賠的基本態度未變，另一方面或許和當權的大人先生們沒有受到切膚之痛也有一些關係吧！

李登輝回台的時候，正是移交、接收、遣送、復員等青黃不接的時候。當時台大農經系沒有高年級，李登輝只有在國語、日語、閩南話夾雜的校園中，重新從大二唸起。李登輝親歷了戰後復員時期台灣的亂象。一九四七年元月，台灣學生響應北京學生抗議美軍姦污北大女生沈崇的暴行而發起的反美抗暴運動，在當時遺留的照片中，我們彷彿也見到高大的李登輝在人群中高喊：美國佬滾出去！。當然，他也親歷了二、三月間爆發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當時身為台大學生“學長”，兼有日本和台灣經驗的李登輝，自然比誰都心知肚明，面對在野黨和反對陣營以二二八事件做為政治鬥爭的訴求，並且無限上綱為台灣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困境，要如何解決二二八問題？李登輝應是提出解決方案最適當的人選。

二二八事件之後，李登輝又目睹了四六事件台灣前途的反省運動。少數人興起了依附美日，促使台灣獨立，脫離中國統治的想法；部份人則對國民政府失望而寄望於赤色中國的興起。以土地改革為號召的中共，對於具有“解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是農業問題”這樣看法的李登輝而言，至少有知識上的吸引力應當是可以理解的。根據當時台大學運領袖之一的吳克泰的說法，李登輝就曾經參與他們的組織，後來在畢業前夕，因為就業問題遂藉口“對於政治沒有興趣”而退出組織。此後，以

台大教員、技術官僚、學者的身份而暫時離開了政治圈。

以筆者對於李登輝以及四、五十年代台灣歷史的了解，筆者認為強勢省主席陳誠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推出有關「三七五減租」的各項實施辦法，當時台灣瀰漫的農業和土地改革氣氛，可能對李登輝的思想發生決定性的影響。今年春天李登輝接受日本《文藝春秋》記者訪談時，他強調：所謂「台灣經驗」的基礎就是「土地改革」，又強調三七五減租政策使「佃農受益匪淺」。顯然三七五減租政策使得李登輝發生重大轉變。一九五三年元月國民政府公布《實施耕者其田條例》，進一步推動比大陸中共遠為溫和的土地改革運動，都使得務實的李登輝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

農經學者時代的李登輝雖然在農業和土改上找到了安身立命之處，同時為後日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他對國民黨也並不是十分欣賞。跡象之一是李登輝遲至一九七〇年在徐慶鐘、蔣彥士力保之下，才加入國民黨。李登輝在台大、合作金庫、農林廳、農復會任職，都是國民黨直接控制下的官方機構，李登輝何以不加入國民黨呢？其二，李登輝和彭明敏等令國民黨頭痛的異議份子交稱莫逆，而且和在紐約暗殺蔣經國的黃文雄過從甚密，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話不投機三句多」，這或許都是李登輝本人才能解釋的問題。

就筆者的理解，台灣有不少學者或技術官僚抱持著：「我做我的研究，我做我的工作絕不參與政治，國民黨也不會把我怎麼樣」這樣的心態。農經學者和技術官僚時代的李登輝，或許也正是如此吧！

三、飛躍的李登輝

一九四九～七〇年的二十年間是李登輝的沈潛期，其間受到徐慶鐘、蔣彥士等農經派官僚的賞識與提拔。一九七二年蔣經國組閣，一舉安排連震東、李連春、林金生、高玉樹、徐慶

鐘和李登輝等六位台灣省籍人士入閣，又命徐慶鐘為行政院副院長，李登輝則以最年輕的四十九歲的學者身份入閣，從此展開飛黃騰達的坦途。

李登輝是台灣省籍青年才俊，又受到副院長徐慶鐘和秘書長蔣彥士的力薦，這是地利和人和。以法政財經為專長的台籍青年才俊那麼多，蔣經國何以獨厚以農經為專長的李登輝呢？這就不得不歸因於大環境的天時了。

一九五〇年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就在台灣維持著中央政府由全國各省精英共治和“地方政府由台灣精英治台”的二元統治結構。一九五〇年的陳誠內閣中蔡培火是唯一的台籍閣員（政務委員），國民黨中央的改造委員中，連震東也是唯一的台籍改造委員。而同時的台灣省政府二十四席委員中（含省主席吳國楨），則有十七席是台籍人士，比率是百分之七十一。

隨著時間的增長，台籍地方政治人物的實力也隨著各人的努力而增長。五八年，連震東成為第一位台籍內政部長；六一年，黃國書成為第一位台籍立法院長；同年，黃朝琴、丘念台成為國民黨的中常委，六三年謝東閔繼丘念台為中常委，都可以說是自然增長。六〇年代末期由於內外形勢的遽變，使蔣經國省察到統治結構的一元化和國民黨的本土化都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於是計劃性地重用原有的台籍政治人物和拔擢台籍青年才俊，造成坊間所謂的“崔苔青時代”。七二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一舉安排六位台籍人士入閣，正是落實“本土化政策”最具體的做法。

李登輝的學養、省籍和中年的成熟、有分寸，正是蔣經國在“崔苔青時代”積極培養的一顆耀眼新星。

一九四九年，國府在台灣開始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五三年起又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生活改善有望，生產更加勤奮，加上其他政策的配合，台灣稻穀的產量由一百二十噸增加到二百二十萬噸，幾乎達到兩倍之多，不僅供給軍需民食，也

有餘糧出口外銷，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民也成為國民黨的積極擁護者。另一方面，國府也致力於工業的發展。一九五三～六〇年間完成兩個四年經濟計劃之後，在六〇年訂定獎勵投資條例，一九六六年成立「高雄加工出口區」，大力推動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台灣平均每人實質所得從一九五三年的1,823元(新台幣)到五九年的2,150元；年增加率平均3.6%。一九六〇年以後則從一九六一年的2322元到六八年的3,673元，年增加率平均為6.77%。而一九六八年的製造業的產值佔國內生產淨額的24%，超越了農業的發展。財經界的官僚陶醉於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和工業化的美夢中；而農經派的官僚則仍然沈迷在土地改革所締造的舊夢中，殊不知此時台灣的農村經濟已經陷於困頓凋敝的慘境。紡織、電子等勞力密集工業的高速發展，使得農村從業人口大量流失，農產品價值偏低，稻穀換肥“不等價交易”的剝削，農機價格過高，運銷制度不合理等等，都使得農業所得偏低，農地價賤；廢耕拋荒比比皆是。

農村凋敝的現象對於具有“農為邦本”以及“戰備農業”意識的執政者而言，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面對在城市中日漸興起的反對勢力，喪失農業人口的支持，更是國民黨的致命傷。這時候，兼具學術與實務經驗，同時又專研台灣農業與工業之間關係的李登輝，在徐慶鐘、蔣彥士力薦之下終於入閣。七二年的蔣經國內閣以徐慶鐘為副院長、蔣彥士為秘書長，再加上李登輝的入閣，使得沒有農業部的蔣內閣成為“經、農內閣”，而李登輝便是此一“經、農內閣”的新農業政策的主要策劃人和督導者，譬如廢除肥料換穀制度、設置糧食平準基金、訂定農產品之保證價格、修正農會法、整頓水利會、重建水力灌溉系統、農地重劃、重建農產品運銷和倉儲制度等等，都有相當明顯的功效。而當年在報導農村真象時出力最大、報導最深刻的記者吳豐山也成為李登輝的朋友。李登輝入閣之後，除了主持新農業政策之外，蔣經國又賦予督導“十項建設”中石化工

業發展計畫的重建，李登輝與石化工業界的關係也由此建立。今年春天台灣石化鉅子王永慶到大陸考察石化投資環境，知情的觀察家都不免要連想到李、王之間的關係。

四、入仕後的學習歷程

未入仕前，李登輝是道道地地的學者，而李政委、李市長、李省主席、李副總統和李總統時代也都仍以學者自居。坊間所謂李總統具有“知識傲慢性格”大約即源於此。就字面的意涵而言，學者是“正在努力學習的人”，李總統或許就是如此自我期許。

早期的心理學家著重於兒童及青年期的發展，認為人的發展止於成年之前。近年則認為成年期的困擾並不亞於青年期。因此，每一個年齡或階段，人們都需要有新的技巧來處理該時期所面臨新問題，開創新生活。因此中國俗語“活到老學到老”在發展心理學上有一定的意義。

學者時代的李登輝所處的環境相當單純，白色恐怖之下的赤色傳言，或許是李登輝未加入國民黨的原因。另一方面，根據李登輝的自述：“光復之後的一段期間，因為看到戰時社會的混亂和人情的淡薄”感傷之餘，使李登輝產生極大的反省。遠離政治是其一，而“否定神的存在，十年之久不再相信任何宗教”是其二。李登輝從美國留學回來之後，重新思考“公義”、“自我”和“生死”的問題，於是又重新回到他所熟習的基督教會中去求取答案，四處奔走了三年，仍然空虛，直到有一天感覺到“只有以純真的心靈體會，才能了解神的話”，才堅定了他對於基督的信仰。

從此以後，客觀理性和主觀的心靈體會就並存在學者李登輝心中。今年五月二十二日，李總統在就職後的首次記者會中，答覆有關“治國理念”和“怎樣來釐清政治與宗教的分際”時李總統說：“宗教信仰對本人來說，比本人得到的幾十年的教